

親密感之日常社會互動基礎： 一個縱貫式的研究

林以正¹ 黃金蘭²

¹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通識學科

論文編號：05026；初稿收件：2005年8月17日；完成修正：2005年12月6日；正式接受：2005年12月8日

通訊作者：林以正 台北市106羅斯福路四段一號台灣大學心理系（E-mail: i890@ntu.edu.tw）

Reis 及 Shaver (1988) 將親密感視為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間的動態歷程。為驗證此理論，本研究於上、下學期分別以羅徹斯特互動量表記錄參與者日常生活中自發性的社會互動十天，之後並就其互動對象以 Q-分類法測量人際親密感。研究結果顯示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在橫斷面上均與關係親密感具顯著相關，其獨立效果也均達顯著水準。此結果在上、下學期均表現出一致的趨勢，顯示相關組型具有穩定性。交叉分析顯示，上學期之各項指標均對下學期之變項具顯著預測力，但關係的親密感比社會互動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上學期之社會互動對下學期之親密感的預測力優於上學期之親密感對於下學期之社會互動的預測力。而且相對於自我表露，知覺同伴回應也傾向於有較強的效果。此結果支持理論的假設，亦即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確為影響關係親密感的重要變項，而在社會互動中發展關係知覺時，知覺同伴回應可能在親密歷程中又扮演了更為核心的角色。結論中筆者也針對本研究對研究設計與分析方法的貢獻進行討論。

關鍵詞：修訂羅徹斯特互動量表，親密感，自我表露，回應

對絕大多數的人而言，人際關係一直是我們生活中的一大課題。打自呱呱落地，人們就立即開始學

習這套知識。每天我們必須有效地和他人互動以影響別人或被影響、幫助或接受幫助；同時也必須要與同事、朋友、及家人溝通。這一切的行為都必須在人際關係的背景下發生，同時也進而回饋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基此，有關人際關係的探討也自然成為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這個現象，在集體主義特色濃厚的文化中尤其顯著。例如，在中國文化中居主流的儒家倫理，其核心就是一套人際關係與人際互動的規範（黃光國，1988；Hwang, 2000）。

欲研究人際關係，首先必須探討其定義及測量的方法。在過去的研究裡，由於缺乏共識以至於研究的結果相當混淆，同時也難以相互比較。在測量方法上，由於關係的特性許多是決定於人際主觀的判斷，因此自陳式（self-report）的測量方法最為常見，其中又以巨觀及微觀二種方法最被廣泛採用。前者往往要求受試者對某一關係提供整體性的評量，而後者則著重在特定社會互動的主觀知覺。即使是測量同一個關係，以上二類方法也經常導致相互衝突的結果。以往這種種不一致往往被視為是一種誤差，或歸因於測量方法的缺失，或因記憶的扭曲。然而筆者認為正確的看法應是：巨觀的測量結果代表個人對其行為，基於個人的動機、目標及感覺等予以加權之後所得到的知覺，它代表一個人對於本身行為重新建構及詮釋的心理歷程。在人際關係的研究中，Duck (1988) 曾做過一個聰明的比喻。他認為人際關係其實是人際互動消化後的一種產物，這個消化的歷程代表一種認知的重組。對這個歷程的研究，即在探討人如何由客觀

的事件發展出心理意義，而這也正是心理學中最核心的問題。

令人驚訝的是，在人際關係的文獻中卻絕少探討日常生活中自發性的社會互動，如何轉化為人際關係的心理歷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探討日常生活中不斷進行的社會互動，如何影響人際關係的整體認知。更具體的來說，本研究將測量二個層次的變項，其一為個別社會互動的層次，另一則為關係的層次，藉連結與比較這二個層次變項間的關係，可使我們進一步了解構成人際親密知覺的社會互動型態。以下將進一步的討論研究日常生活社會行為的重要性，以及人際親密感的相關文獻。最後並提出人際親密感實為自我表露 (self-disclosure) 及知覺同伴回應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二者間共同效果的研究假設。

雖然以往研究社會行為的報告已經不勝其數，但缺乏適當研究方法卻使得實際知識的累積進展緩慢。根據 Clark 及 Reis (1988) 所做的回顧，在 1987 年前絕大部份人際關係的研究，均是在實驗室中針對不相識的陌生人為對象所進行的。然而對於我們所真正關切較長期性的人際關係，則瞭解極少。Berscheid (1986, 1999) 甚至結論：對於長期的人際關係，社會心理學的知識僅次於一無所有。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實驗室的研究方法是不好的，實驗室的操弄對於尋求因果關係仍是最有效的方法。但這樣的優點，卻也往往造成推論廣度的限制。而這樣的限制，對於人際關係的研究，又特別的明顯。要知道，親密關係的形成，必須建基於持續不斷的互動，然而實驗室的操弄卻又只能針對一次或少數的社會互動加以控制。此外，由於受試者意識到自己是被觀察的對象，這種強烈的自我覺察，也容易使得在實驗室中所表現的行為，有別於日常生活中真正的方式。

近年來，在人際關係的領域中，研究的興趣有逐漸移轉至以田野取向的方法來檢驗日常的生活經驗之傾向。這些每天的生活經驗包括感覺、思考、社會互動等等佔據我們大部份時間，雖然這些行為都只是日常生活之中小小的社會互動，初看之下似乎瑣碎，但是他們的累積效果卻是不容忽視的 (Reis & Rusbult, 2004)。舉例而言，在 Reis (1984) 研究社會互動對於健康的影響中，他以羅徹斯特互動量表 (Rochester Interaction Record, RIR) 記錄受試者每天中超過 10 分鐘或以上的社會互動。結果發現社會互動中的親密感，才是決定社會支持及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更進一步的，Gable、Reis、Impett 及 Asher (2004) 也同樣地以 RIR 此一測量方法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在日常社會的互動之中，表

露正向的生活事件與正向情緒經驗的程度最能夠預測其主觀幸福感。此外如 Csikszentmihalyi 及 Larson (1984)、Hinde (1979)、Murray、Bellavia、Rose 及 Griffin (2003) 與 Stone 及 Neal (1984) 等也都以實徵或理論等方式強調日常社會行為的描述對於瞭解人際關係運作型態所具有的重要性。

關係是社會互動經驗的重構

對日常生活社會行為的描述固然重要，但是這只是一個起步，卻絕非研究的目標。即使研究者能夠記錄下每一個社會互動的細節，仍然無法拼湊成一個完整人際關係的圖像。因為一個最核心的因素並未被納入考量：那就是個人對於自身行為及他人反應的獨特詮釋。倘若忽略了個體對其經驗的獨特詮釋，所得的資料仍失之於片面。正因為這個詮釋具有如此的重要性，部份的研究者，如 Chelune、Robinson 及 Kommor (1984) 甚至把關係定義成：由社會互動中所發展出的期望。為了要進一步的瞭解人類對於社會的解釋歷程，以下將簡略的討論在親密關係所發生的認知歷程。

在社會心理學中，有關人際關係及社會判斷的認知歷程的研究已經有相當的歷史。然而自 60 年代以後，有關認知歷程的研究卻產生了重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對於本研究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傳統的認知理論，往往把人視同為一個科學家，嘗試著客觀的瞭解、分析、預測、及控制他們的社會環境 (Heider, 1958; Kelley, 1967)；有些理論甚至會認為人類會試著站在第三人的客觀立場來觀察自身的行為 (Bem, 1972)。基於這樣的假設，人類應當可以對自身的行為提出相當客觀而且準確的報告。然而近年來的研究卻相反的指出，人類的社會判斷在許多情境下，實際上並不是理性而正確的。Fiske 及 Taylor (1984) 就指出，與其說是一個追求事實的科學家，不如說人類其實是想以最有利的方式，驗證自己腦袋裡已主觀存在的假設。許多具體的研究結果也指出，人們在回顧過去的經驗時，往往有許多系統的偏差 (Markus, 1977; Tversky & Kahneman, 1982)。

這些偏差，在過去往往被視為一種應該在研究過程中被排除的因素，例如效度、信度等概念，便是以排除偏差為主要的目標之一。但近年來，研究者已逐漸瞭解到，這些人類認知上系統的偏差，本身就是具有意義的 (Fletcher & Fincham, 1990)。舉例而言，Ross (1989) 證實人們在回憶過去的經驗時，往往不是根據事件的內容，而是以自己內在的理論對事件重新整理的結果。其他的研究 (例如：Swann,

1987; Swann & Hill, 1982; Markus & Smith, 1981) 也指出人們較易報告和其自我概念一致的事件。在人際關係的研究中, Murray、Holmes及Griffin(1996)甚至主張關係滿意度的提昇必須倚賴關係中的伴侶能夠將對方的不完美加以理想化的程度。而最具代表性的則是近年來對於成人依戀理論的研究。Cassidy及Shaver(1999)與Mikulincer(1998)等人均主張一旦在依戀關係建構出個體的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 它隨之就會主導個體對於關係的詮釋、記憶的建構, 或甚至動機的方向。

這種理論的改變, 也直接的影響了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研究者開始把人際關係的形成, 視為對於社會互動的一種認知重組。人們針對社會互動作選擇性的處理, 主觀的加以分析, 給予不同的比重, 最後再統整成一個對某一特定關係的整體知覺。許多的研究者也逐漸的瞭解這個重組歷程的重要性。例如Duck及Miell(1986)就發現人們經常在關係初發展階段所經驗到不確定感, 只有讓他們每天保持日記式的記錄才能發現得到。若是在關係發展已經20週年後, 再作回顧性的描述, 這種不確定感已經無法測得。Duck(1983)認為目前最需要探討的正是對於這個個人的「編輯」的心理歷程, Reis及Downey(1999)甚至指稱「思考是為了連結」(thinking is for relating)。在本研究中, 筆者將針對此一歷程, 比較輸入的社會互動及輸出的關係知覺之間的聯結, 以探索上述的認知重組歷程。然而關係所包含的層面太廣, 筆者將以人際親密感作為本篇的研究重點。

親密感與人際關係

親密感(intimacy)無疑地在人際關係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在Caldwell及Peplau(1982)的研究中就發現73%的男生及83%的女性認為和少數的朋友發展出高度的親密感, 才是他們最為偏好的人際關係型態, 而在針對愛情三角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Sternberg, 1986)的實徵驗證中也往往發現親密感其實是愛情最為核心的因素(Sternberg & Grajek, 1984)。此外, 親密感與人際適應及心理健康也具有極密切的關聯(Reis, 1984)。因為它的重要性, 親密感的相關研究也就成為社會心理學界中一個極為熱門的研究題材。在Reis(1990)所做的文獻回顧就發現在1988年的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期刊中, 有超過半數的研究是和親密感有關的。即便是在十幾年之後, Reis及Rusbult(2004)在他們最近的回顧文獻中, 仍然將親密感列為研究關係發展的三個主要核心議題之一。從人際關

係的研究者對於這個議題不斷的關切之中, 我們也可以了解親密感不止對於一般的人際關係具有重要性而已, 對於以科學方法來理解關係歷程也同樣具有其關鍵的地位。

自我表露與親密感

自Jourard(1964, 1971)所作的創始性研究之後,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已經成為人際關係的研究中, 被討論得最多的一項行為。在自我表露的文獻中, 有二個現象曾被反覆的驗證。其一是, 自我表露的接受者通常會以相同程度的自我表露來回應(如Cozby, 1973; Derlega, Harris & Chaikin, 1973; Ehrlich & Graeven, 1971); 第二個現象是自我表露者通常會獲得別人的喜愛(如Davis & Skinner, 1974; Lynn, 1978)。綜合這二個現象, 我們也可以看出自我表露對於親密感的重要性。在關係中的兩人, 隨時間作越多的自我表露, 將引發彼此間更多的表露, 也更喜歡對方。在這個過程中, 也增進了雙方的了解。而這種對彼此深層的了解, 將會有效的減低不確定感, 增進彼此的信任及相依。

過去有關自我表露的研究, 往往因研究方法的限制, 以至於它在較長期性的人際關係中的功能仍然模糊不清。且, 大多數的研究都在實驗室中進行, 常常只能就陌生人間的互動加以研究。此外, 因受試者強烈被觀察的自覺, 也容易使得在實驗室中所表現的行為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有很大的差異。但儘管有這些限制, 自我表露仍無疑的是親密感的一個主要成份。由Warning、Tillman、Frelick、Russell及Weisz(1980)等人的調查中也發現,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 所謂的親密是指個人在思考、感覺、興趣、甚至幻想等私人事件上的分享程度。自我滲透理論(self-penetration theory, Altman & Taylor, 1973)也主張伴隨著關係由初識到深交, 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其中的自我表露也隨之由表面逐漸地轉為深刻且親密。由於自我表露對親密關係具有如此緊密的重疊性, 部份的研究者甚至把自我表露視為親密感的一種操作性的定義(如Stokes, 1987)。

回應(Responsiveness)與親密感

但自我表露真的等同於親密嗎? 有些研究者則認為親密實際上是一個多向度的概念。除了自我表露之外, 溝通的型態也具有其重要性。例如Montgomery(1981, 1984)就認為反應的立即性、情緒的開放性, 也會影響關係的品質。其它的研究者,

如 Helgeson、Shaver 及 Dyer (1987) 或 Waring 及 Chelune (1983) 也認為自我表露應是親密的一個必要非充份條件。

基於對這個區辨的反省，有關回應 (responsiveness) 在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被研究者反覆的提出來討論 (Berg & Archer, 1980; Berg & Clark, 1986; Davis & Perkowski, 1979; Murray, Rose, Holmes, Derrick, Podchaski, Bellavia, & Griffin, 2005)。所謂的「回應」是指「互動的一方針對另一方的行為、溝通、需求及期望的應對方式及程度」。若是在溝通的情境下，那麼回應則指涉自我表露之接受者對於該自我表露的接受、興趣與了解。若是在資源分配的情境下，則回應指涉的是分配者對於受分配者的需要之關切程度。但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回應代表互動之一方對於同伴的了解與關切。

在實驗室的研究中，Berg 及 Archer (1982) 發現若受試者被要求去製造別人對他的好印象，受試者會傾向於採取與回應有關的策略。他們甚至進一步的分析認為，傳統在自我表露文獻中的相互性現象 (reciprocity)，也可以重新由「回應」這個觀念來詮釋。除了傳統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之外，回應的觀念和 Bowlby (1979, 1982) 的依附理論也若合符節。依戀理論強調一個敏感而有善於回應的主要照顧者將能夠有效的形塑兒童的安全依戀，而這樣的論述在成人依戀的相關研究中也得到非常多的驗證 (Cassidy & Shaver, 1999)。綜觀這些理論，他們均一致地強調適當的回應可以維持合諧的互動、鼓勵自我表露、增強喜歡及提昇信任感。

以上回顧了以自我表露及回應來探討親密關係的二個不同的觀點。這二個觀點表面上看來各有其不同的著重點，也各有實徵的證據支持。但若深入的思考，這二者並非彼此不相容，事實上更應是一個關係的兩面。為了描述此兩者的互動關係，Reis 及 Shaver (1988) 便提出了一個相關的統整性理論，他們主要的著眼點則在於將親密感的形成視為一個動態的歷程。在這個理論中，他們描述親密感為一個人表達其內在的情緒後，因同伴的回應而感到被了解、關懷、及肯定的歷程。簡言之，親密的歷程始於人際互動中的一方表達內在的情感或訊息予他人，而後，另一方又能回饋予適當的反應。所謂適當的反應，意指表露者能感受到另一方充分的瞭解、誠心的關懷，並且肯定其內在的自我概念。

這個理論的特色是它並不強調單一因素的重要性，相反的，它主張自我表露及適當的同伴回應二者的適當組合，才是構成親密的基礎。亦即自我表露並不能構成親密，它其實是一個起始的刺激，而其效果

則須視同伴的回應程度而定。這個理論的另一個特色是強調歸因及主觀詮釋的重要性，不論行為的原始意圖為何，倘若無法與表露者欲被瞭解及肯定的期望相符，這個行為仍無法有效的促進親密。他們這個對於主觀詮釋的強調，和筆者前面所強調的認知歷程不謀而合。亦即，雖然社會互動的某些特徵是可以被客觀描述的，但是人們如何由這些特徵而形成整體的知覺，更具有其重要性。

雖然這個理論有效的整合了傳統上互不相容的概念，但是由於這個理論強調因素間不斷的互動歷程，難以在實驗室中進行，而對於日常生活互動歷程，更因方法上種種的困難，至今仍只有兩篇研究直接針對此一理論提供驗證 (Laurenceau, Barrett, & Pietromonaco, 1998; Lin, 1992)。這些研究雖然嘗試改進這個理論僅止於對單一人際互動的描述之缺點，但是實際的社會生活中，親密關係的形成與改變都需要歷經長時間的連續互動，建基於單一橫斷面的互動模式，顯然並不能描述充分此一親密歷程，因此縱貫性的研究設計，同時比較橫斷面的相關組型，並且對改變的效果進行估計才能充分的考驗此一理論。

針對這些研究缺口，本研究將基於 Reis 及 Shaver (1988) 的理論，作更進一步的延伸，測量日常生活中不斷進行的各個自發性人際互動，聚合不同互動對象及多重的互動，來對親密關係的形成歷程及其與人際互動的關係作深入的探討。本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的特色是由於研究的主要目標，在於探討長期性人際關係中的親密感，並著重於日常社會行為的測量。基於此目標，實驗室的方法實不可行，而在一般橫斷式的相關研究方法，對於人際關係與社會互動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又極易混淆。針對這個問題，本研究乃針對大學生，作為期一年的縱貫式研究。除了在兩個橫斷的時間點上，探討社會互動與關係親密感之間的關係之外，也進一步地嘗試以關係親密度在時間序列上的改變作為依變項，探討社會互動因素對於人際關係歷程的影響，藉此對其因果模式作進一步的澄清。

研究方法

受試者

由於本研究係一年之追蹤研究，受試者分別於上、下學期各記錄其社會互動一次。上學期中共有 18 位男性及 30 位女性，共 48 位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的學生完成資料搜集。下學期中，實驗者再針對這 48 位同學再予追蹤，邀請其再次參與本研究，共獲得男性 17 位及女性 23 位同意參與並完成資料收集。

研究工具

修定羅徹斯特互動記錄 (Revised Rochester Interaction Record, RIR)

本研究採用 RIR 以測量每天日常的社會互動。RIR 是專為描述日常的社會互動而發展出的一套詳盡的測量工具 (Wheeler & Nezlek, 1977)。過去的研究結果不僅證實以 RIR 這類型的測量方法所衍生的指標，確實可以廣泛的預測各種健康與人際關係的指標，顯示其具相當的效度，並且可以避免一般自陳式量表的許多缺失 (Wheeler & Reis, 1991)。在國內目前雖然仍未有相關的研究，不過林以正 (1999) 以相同的研究方法請實驗參與者記錄其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比較，其研究結果也發現，這種日誌式的紀錄方式確實能夠有效的預測關係中社會比較的情緒反應，這顯示此一方法可以有效的測得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與感受。

這個工具要求受試者針對每一個超過 10 分鐘的互動填寫一份日記式、固定格式的記錄表 (見附錄一)。由於記錄係針對單一人際互動事件，於互動結束之後立即的記錄，不易受到記憶的扭曲，因此可以提供準確而詳盡的資料。此外，雖然記錄是以單一社會互動為對象，但是透過對互動對象等的聚集分析，RIR 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側面圖 (profile) 及描述社會互動的指標。所謂的「聚集分析」指的是將同一類的社會互動記錄計算各項指標的平均值，以此來描述該類社會互動的特性。例如，研究者可以將所有以同性朋友為對象的社會互動歸為一類，然後將其中所包含的社會互動指標加總或平均，以反應該參與者與同性朋友之互動型態。此聚集分析的方式除了增加指標的信度之外，也能夠增加資料分析的豐富性。因此也可以幫助我們對社會互動的不同面向，有較完整的了解。

一般而言，RIR 可以產生包含每日平均互動次數、每日平均互動時間、平均互動長度等量的指標。此外，針對各評量項目也可以測得自我表露、知覺同伴回應、親密及滿意度等質的指標。在本研究中，更進一步地依據受試者對不同互動對象的人際親密感程度上的分類，做成不同的側面圖分析。因此，對於受試者社會互動的描述也就更為完整。

親密感的 Q 分類 (Intimacy Q-sorting)

每一受試者依據研究者所提供的定義，將他們在記錄期間內所有的互動對象，分類成不同程度的親

密度，基於本研究採用受試者內設計的特性，這種修訂後的 Q 分類，將有助於減低一般評量量表所造成的偏差。

研究程序

由於本研究係採縱貫式的實驗設計，於上、下學期中，針對同一群受試者各進行一次實驗。每一次的實驗各包含三個階段，前後持續各約一個月的時間。以下筆者將詳細的描述在每次資料蒐集中，各階段進行的工作。

進行步驟概述。本研究共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說明會，研究者向受試者說明如何記錄他們的社會互動。其次是實際記錄階段，受試者使用修訂的互動記錄表記錄所有 10 分鐘或以上的社會互動，共記錄 10 天。最後一階段則評鑑記錄的精確性，並請受試者對他的所有互動對象根據一些人際屬性以 Q 分類進行評量。以下針對各階段的進行作詳細說明。

第一階段。本階段進行 4 至 6 人的小團體解說會，旨在解釋研究目的、過程以及提高受試者繼續參與研究的動機。因此，特別著重於與受試者建立信任且投入的關係。

首先，實驗者須強調記錄的正確性及受試者的高參與度在本研究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在記錄正式開始前需舉辦解說會。緊接著，即簡單說明本研究所關切的問題是在於日常生活中社會互動的型態。過去有關互動的研究大多侷限於在實驗情境中進行，其結果很難類推到真實生活中。而本研究冀望能發展修訂一項新的測量方法，使心理學家得以進行真實生活中的社會互動研究。實驗者在此時需嘗試說服受試者，他們真實上是扮演協同研究員的角色，發展一項極具創意的研究法。另一方面，也須對受試者資料的保密性及其權益提出強力的保證，他們可隨時退出實驗甚或取回記錄表的權利。這些為營造合作氣氛所做的種種努力，旨在提高受試者合作的意願以及記錄的準確性。

其次，向受試者說明他們需要進行的工作。包括第二階段為期 10 天，針對每一個 10 分鐘或以上的社會互動填寫一份記錄表，以及第三階段，在受試者約定的方便時間到實驗室進行一項晤談，並填寫問卷，為時約一小時。

在簡單的流程介紹之後，即發給每位受試者一份完整的指導手冊，一張姓名-縮寫對照表以及三天份的互動記錄表。隨後即按指導手冊的順序逐一說明如何填寫互動記錄表。首先向受試者說明所謂「社會互動」的定義是：

「任何一個情境，若包含兩個或以上的人，且其成員的行為是對其他成員行為的反應，謂之社會互動。交談即是屬社會互動的一個最淺顯的例子，當然還有其他的類型存在。然而僅僅是與他人在一起並不足以形成一個社會互動，例如，一起看電影，若沒有與鄰座的人交談就不是一個互動。要成爲一個互動必須要互有反應，如談談電視內容，交換心得等。任何一種『有來有往』反應的社會活動都算，包括交談、工作、消遣等。因此，跳舞是互動，但聽課卻不能算是互動（即使偶爾問問題）。」

受試者的工作是將每一個超過 10 分鐘的互動都記錄下來（以 10 分鐘爲標準爲的是減輕受試者的負擔）。實驗者同時需強調記錄的及時性是非常重要的，亦即在互動完時即須馬上記錄。因此特將記錄表每 9 份訂成一本小冊子利於隨身攜帶。提醒並要求受試者隨身攜帶並立即記錄。

接下來，則是對記錄表內容做詳細的介紹。包括日期、時間、互動長度的記錄方式依次做說明：在每一份記錄表中，受試者需將在該次互動中的每一互動對象的姓名縮寫記下來並圈選其性別。實驗者此時須強調在本研究中，受試者對每一互動對象須有相對應的特定姓名縮寫。爲了確保不致發生不同互動對象卻使用同一姓名縮寫的現象，要求受試者還需每天增補姓名-縮寫對照表並進行查對。然後，請受試者依據他對該次社會互動的真實感受以 7 點量表對其他題目作答。在這些題目中需做特別說明的是「傾吐事實」與「傾吐情緒」的區分。兩者都是自我表露，但傾吐事實指的是吐露有關他自己的一些私人資料，傾吐情緒則指的是吐露自己的情緒、價值及意見的程度，例如「我以前吸毒」及「我很慚愧以前吸毒」是屬不同類型的表露。此外，也須向受試者概要說明親密、愉快、發起、影響等項目的意義。其他的題目多屬清晰易懂，可請受試者自行仔細看一遍。看完後，則由實驗者問幾個問題以確定所有受試者都了解題意。最後詳加解釋「性質」的類別及判斷。

爲進一步訓練並提高受試者填寫記錄表的正確性，實驗者提供三個社會互動的例子進行團體討論，請受試者說明他們可能會圈選的項目及填寫的方式，實驗者則針對他們的說明給予回饋。此時實驗者須再次強調記錄表的填寫包括事實與主觀感受的描述。如果他們在填寫時遭遇任何困難，可隨時與實驗者聯絡。

接著向受試者說明爲增加記錄的可信度，他們

必須每隔 2 至 3 天到實驗室交回記錄本並領取空白記錄本。並請受試者當場即約定第一次交回之時間。緊接著若受試者同意參加本研究即請其簽下同意書，並在離去前填寫一些問卷¹。

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爲實際社會互動的階段，自指定日開始爲期 10 天。在開始記錄的前一天，實驗者需以電話提醒受試者在隔天一起床就須記錄。在每一繳回日的前一天，也需再以電話提醒他們須將記錄本及姓名-縮寫對照表帶來。受試者交回記錄表時，實驗者必須詢問有無困難或模稜兩可、不知如何填寫的情形，並檢視記錄本有無漏答或錯誤處，更重要的是給予受試者回饋與鼓勵。同時歡迎受試者對研究提供意見及建議。所有受試者在第二階段中須繳回 3 至 4 次的記錄本，並在最後一次時繳回姓名-縮寫對照表。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包括晤談與分類作業。在受試者到實驗室前，實驗者先檢查姓名所寫對照表與 RIR 記錄表所寫的是否一致。並將每個姓名縮寫一一抄在姓名縮寫卡上。在晤談時，實驗者首先請受試者估計他們填寫 RIR 的困難度、正確性，並預估他人填寫 RIR 時的正確性以及他們自己在記錄期間漏填的社會互動百分比，以評量記錄表之使用狀況及資料之可靠性。

接著，受試者需將姓名縮寫對照表上的姓名縮寫抄於問卷表上，並針對每一互動對象寫下其性別、與其之關係以及該關係維持的時間（長度），最後並評量與該互動對象之熟悉度。實驗者需確定受試者一次對一位互動對象做完評量再作下一位互動對象的評量；其次，受試者需針對這些互動對象選出三位最好的同性朋友、三位最好的異性朋友、三位最好的朋友以及男（女）朋友的姓名縮寫。如此，受試者也能重新回憶這些互動對象的姓名縮寫及與他們之關係。

在緊接下來的分類作業中，受試者在看完欲分類之屬性，如親密的定義之後，利用姓名縮寫卡將所有的互動對象依不同的親密程度分成四類，類別由「一點都不親密」到「非常親密」間變化。雖然並不強限定每一類別的人數，但爲更能區辨不同的親密程度，實驗者需請受試者至少在每一類中分派一或兩人²。在受試者完成分類測驗後，請他們填寫一些心理量表，包括寂寞、憂鬱及內外控等量表，即完成整個實驗程序。完成本階段之受試者將於下學期結束前，再度被邀請來參與本研究。屆時，再以上述三階段之實驗程序反覆實施。

本研究透過使用記錄表的方式來探討日常生活的社會互動，可大幅提高資料的準確性且不受記憶及選擇的影響，又可衍生多樣化的指標，對於本研究而

言，極為適切。但是相對的，它在實施的過程及人力的需求上，也較為困難許多，其中最困難的部份在於如何鼓勵受試者參與並完成實驗的動機。由於記錄的時間長達 10 天，對於受試者確實形成沉重的負擔。為了克服此一困難，實驗者嘗試利用各種方式，盡可能的與受試者建立合諧而且信任的關係，並賦予參與的使命感。而在記錄期間，也不斷的給予鼓勵及瞭解，並於實驗結束之後，給予適當的回饋。

結果

社會互動的一般描述

為了對受試者的社會互動提供一個一般性的描述，筆者首先將受試者的社會互動作聚集分析，形成整體社會互動的側面圖。表一所呈現的是男、女性在整體的社會互動上的各項指標平均值。就社會互動的量而言，在上學期男生平均每天有 5.3 個社會互動，女生有 5.1 個社會互動；在下學期男生平均每天有 4.3 個社會互動，女生有 4.7 個社會互動。不論上、下學期，男女生的差異均不明顯。若綜合五個社會互動的側面圖，在全部 110 個男女性別的 t 檢定中，只有 4 個達到顯著水準，其比例低於 5 個的機率水準。因此在後續的分析中，筆者一律將男女合併分析。

表一

男女生在上、下學期中整體社會互動各指標的平均值

社會互動指標	整體社會互動			
	上學期		下學期	
	男	女	男	女
平均每日互動次數	5.3	5.1	4.3	4.7
平均每次互動時間	63.0	56.7	61.9	56.6
自我傾吐情緒	4.1	4.0	3.8	3.8
自我傾吐事實	4.1	3.9	3.9	3.6
他人傾吐情緒	4.1	4.2	3.8	3.8
他人傾吐事實	4.2	4.1	4.0	3.7
親密	4.1	4.1	3.8	3.8
愉快	4.4	4.6	4.3	4.1
發起互動	4.1	3.9	4.1	3.8
影響互動	4.1	3.9	4.1	3.7
知覺同伴回應	3.7	3.7	3.5	3.4

此外，如前所述，在上學期共有 48 位受試者完成資料蒐集，而下學期則只有 40 位受試者完成實驗。為了檢驗這八位流失的受試者是否具有特殊的社會互動模式，或完成實驗 40 位受試者是否為特殊的樣本，筆者乃針對這兩組受試者進行各變項的 t 檢定。結果顯示在所有 55 個可能的 t 檢定中只有 1 個達到顯著水準，其比例亦低於 5% 的機率水準。故而樣本的流失，應並未造成選擇性的偏差。

此外，由於參與者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持續的即時記錄其社會互動，這與一般的習慣並不相同，因此研究者特別在記錄之後的晤談中請參與者自評其記錄過程的困難度、正確率、以及缺漏記錄之百分比等。結果顯示參與者在六點量表的正確率評量之平均值為 4.6，標準差為 0.77；困難度之平均值為 2.75，標準差為 1；因為記錄而影響其社會互動的程度平均值為 1.63，標準差為 0.9；遺漏未記錄的百分比平均值為 9.3，標準差為 9。由這些主觀的評量來看，雖然參與者覺得做這樣的記錄有一點困難，但是其正確率仍相當高，漏失比率低，也並沒有明顯的因為記錄這些互動而改變了互動的方式。

本研究採用事件導向 (event contingent) 的日誌式紀錄，每一個記錄都是針對一個特定的社會互動，其情境、對象與事件都不同，因此邏輯上並不見得完全適用傳統計算信度的方式。但若假設每一個個體的社會行動是個體性格的一種展現，因此會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那麼即使情境與對象有某個程度的變化，其基本的社會互動模式應當還是會呈現出特定的模式，那麼傳統的折半相關也就可以被用來檢驗此測量方法的信度。在本研究中平均每位研究參與者在上學期有 51.9 個互動記錄，下學期平均有 45.7 個互動記錄。依上述之推論，倘若將每位實驗參與者的社會互動記錄隨機分為兩半，各自計算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兩個指標之得分，並計算其相關，也就可以得到類似折半信度的相關係數。分析結果顯示，在上學期的資料中，自我表露之折半相關為 .93，知覺同伴回應之折半相關為 .87。在下學期的資料中，自我表露之折半相關為 .93，知覺同伴回應之折半相關為 .93。

上述的折半相關顯示，雖然每個社會互動都是一個獨特的事件，然而就每一個實驗參與者而言，他們還是會呈現出相當穩定的社會互動型態，其社會行動具有類似於人格特質的跨情境穩定性，同時也顯示採用 RIR 這類的研究方法確實可以穩定的測量到此一社會行動的個別差異。

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對關係親密感的效果

在本節中，筆者主要將探討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二者對關係親密感所造成的效果。自我表露包括「傾吐事實」及「傾吐內在感受及情緒」二個項目。知覺同伴回應則包括「了解我」、「關切我的感受與情緒」及「引起共鳴」三個項目，分別代表 Reis 及 Shaver (1988) 理論中之了解、關懷及肯定三個反應向度。依前所述，筆者預期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均應對關係親密感有顯著的預測力。由於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二者均為連續變項，而且不論是自我表露或者是知覺同伴回應，其上下學期之分配的偏態與峰度值均小於 1，均符合常態分配的要求。此外，根據 Neter、Wasserman 及 Kutner (1985) 對於迴歸共線性問題之方差膨脹因子 (VIF) 檢驗法，本研究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兩者間對親密感之 VIF 值在上下學期的資料中分別為 4.85 與 4.70，均小於 10，因此並未超過臨界值，顯示本研究的結果並沒有嚴重的共線性問題，依然適合採用迴歸分析。當然，在本研究中 VIF 值雖然小於臨界值，但是仍然偏高，這使得本研究的統計檢定力下降。但是倘若改採無母數分析，統計檢定力降低的幅度將更大。因此在權衡本研究之資料仍符合迴歸分析之基本假設下，本節將採迴歸分析法以充分的運用資訊。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個人如何經由不斷的社會互動，而使其不同的互動對象分化成為不同的親密程度，因此本研究乃為受試者內設計，所擬探討的是受試者內不同互動對象間親密程度，及與這些不同互動對象之社會互動（包括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二類變異量之間的關聯。基於受試者內設計的特性，本研究中的迴歸分析亦需以二個步驟的階層式迴歸分析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才能完成 (Repetti, 1989)。步驟一的迴歸分析首先將受試者間的變異量去除。筆者依受試者的編號製造出 $n-1$ 個虛擬變項 (dummy variables)，並以此為預測變項來對關係親密度進行迴歸。在步驟二中再以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二項為獨變項加入迴歸式中，觀察由步驟一至步驟二之間的 R^2 的改變量。由於受試者間的變異已於步驟一中去除，在步驟二中所觀察到的 R^2 之改變量均應屬受試者內之變異。以上的程序也可以用下列的方程式來表示：

$$Y_{ij} = (\text{Subj}_1 + \dots + \text{Subj}_{n-1}) + X_{ij}$$

其中， Y_{ij} ：第 j 個受試者對於其第 i 個互動對象的關係親密度之評量。

Subj₁...Subj_{n-1}：為虛擬變項。

例：第 j 個受試者的 Subj_j 為 1，而其他為 0。

X_{ij} ：代表第 j 個受試者對其第 i 個互動對象在某個互動指標上的平均分數。

本研究之所以採取以上的受試者內迴歸 (within-subject regression)，乃是因為筆者希望將研究的焦點置於「關係」而非「個別差異」上。舉例而言，倘若受試者甲向對象乙作了某個程度的自我表露，就甲而言，這個自我表露的行為可能有二個來源。其一為甲本身自我表露的傾向，而每一個人的這種傾向可能不同，這就是個別差異的部分；另一方面，這個自我表露也可能是因為與這個表露對象的關係所造成。雖然是同一個受試者，但是在不同的對象表露的程度也會不一樣。因此，這是屬於受試者內的變異，其意義則代表人際關係層次的影響。由於上述之受試者內迴歸在功能上類似於偏相關 (partial correlation)，因此迴歸式中預測變項與被預測變項屬於個別差異的變異量均將被排除。據此，我們將可以控制因人格因素或個別受試者使用量尺的偏向等問題，而將研究的焦點專注於人際關係的歷程。

以上的迴歸分析還可以被進一步的延伸來探討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等變項的獨立效果，上述的迴歸分析在第二步驟中探討的是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二個變項各自的單純效果。然而這二個變項之間其實具有相當高的相關 (上學期， $r = 0.5, p < .01$ ；下學期， $r = 0.4, p < .01$)。換言之，在各變項的單純效果中，其實有相當大的變異是由二者共有的。為了對變項間的關係作更精確的描述，本研究擬進一步的探討各變項的獨立效果 (unique effect)。欲達成此一目的，在迴歸分析中，則是以階層式的迴歸在完成上述二步驟之後，再加入欲探討其獨立效果之互動變項。此時所得之 R^2 的增加量，即為該變項的獨立效果 (Cohen & Cohen, 1975)。

根據上述的分析策略，筆者首先對上、下學期的資料分別做二個橫斷式的分析，除了驗證 Reis 及 Shaver (1988) 的理論模式之外，並比較上、下學期所得到的結果是否具有一致的組型。茲分述如下：

上學期的迴歸分析結果摘要如表二。結果顯示自我表露可解釋 14% 關係親密度的變異量 ($F(1,882) = 149.66, p < .001$)。知覺同伴回應則可解釋 19% 關係親密度的變異 ($F(1,882) = 232.17, p < .001$)。二者的獨立效果也均達顯著的水準 (自我表露， $R^2 = .01, F(1,881) = 9.59, p < .01$ ；知覺同伴回應， $R^2 = .06, F(1,881) = 80.82, p < .001$)。而且當自我表露及知覺

表二

上學期中以受試者迴歸由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預測關係親密感

預測變項	ΔR^2	F
受試者間個別差異 (虛擬變項)	.11	2.48**
單純效果		
自我表露	.14	149.66**
知覺同伴回應	.19	232.17**
交互作用	.00	.2
獨立效果		
自我表露	.01	9.59*
知覺同伴回應	.06	80.82**
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 合併效果	.20	142.86**

1. 由於受試者內迴歸係以每一個互動對象為分析單位，故單純效果之自由度為 (1, 882)；獨立效果之自由度為 (1, 881)；而交互作用之自由度為 (1, 880)

2. * $p < .05$ ，** $p < .01$

同伴回應二者皆進入迴歸式時，共可解釋關係親密感全部變異量的20%。綜合而言，此結果支持原先依據 Reis 及 Shaver (1988) 之親密理論所推演之假設，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二者均為親密歷程中之重要變項。

針對下學期的資料，筆者也進行了相同的分析，結果摘要於表三。由表三可知，下學期的資料分析結果，和上學期的分析結果大體相同。關係親密感的變異量有13%可由自我表露解釋 ($F(1,611) = 100.94, p < .001$)，而有18%可由知覺同伴回應所解釋 ($F(1,611) = 153.12, p < .001$)。雖然由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之間具高相關，而使得上述之解釋變異量有12%為兩者所重疊的部分。然而二變項之獨立效果卻依然顯著 (自我表露， $R^2 = .01, F(1,610) = 9.83, p < .01$ ；知覺同伴回應， $R^2 = .06, F(1,610) = 54.62, p < .001$)。若將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合併進入迴歸式則共可解釋19%之關係親密感的總變異量。此一結果再次的支持了「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對於關係親密感確有顯著的效果。

此外，若比較表二與表三亦可看出上、下學期，所得之結果具有完全相同的組型。二者均顯示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在單純效果及獨立效果上均達顯著，而且上、下學期在效果量 (effect size) 上僅有微小的差異。另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雖然自我

表三

下學期中以受試者迴歸由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預測關係親密感

預測變項	ΔR^2	F
受試者間個別差異 (虛擬變項)	.11	2.60**
單純效果		
自我表露	.13	100.94**
知覺同伴回應	.18	153.12**
交互作用	.00	2.2
獨立效果		
自我表露	.01	9.83*
知覺同伴回應	.06	54.62**
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 合併效果	.19	96.60**

3. 由於受試者內迴歸係以每一個互動對象為分析單位，故單純效果之自由度為 (1,611)；獨立效果之自由度為 (1,610)；而交互作用之自由度為 (1,6

4. * $p < .05$ ，** $p < .01$

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在上、下學期中均達顯著，但知覺同伴回應的效果量均高於自我表露。此一現象在獨立效果中又特別明顯。就自我表露而言，有93%的單純效果是與知覺同伴回應重疊的，然而知覺同伴回應卻有32%的單純效果是獨立於自我表露之外的。

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的交互作用效果

根據 Reis 及 Shaver (1988) 的理論，筆者原預期「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應有顯著的交互作用效果。亦即，若受試者與某互動對象的社會互動大多為高自我表露與高知覺同伴回應，那麼這二個人的關係應被知覺為具有高親密感。為檢驗此一效果，在迴歸分析中，筆者首先計算一個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二變項的乘積項，並將此乘積項於虛擬變項、自我表露、知覺同伴回應已置入迴歸式以後，以階層式迴歸再將此乘積項置入迴歸方程式中，並檢驗此步驟所增加之 R^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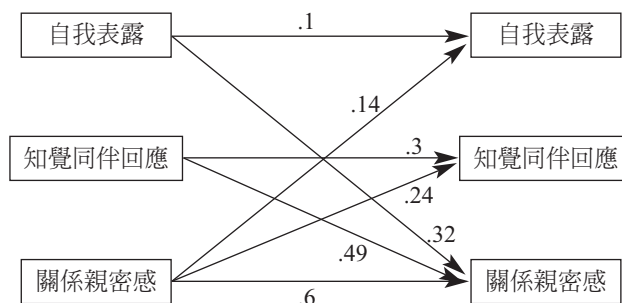
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不論在上學期或下學期的資料中，此一交互作用的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此一結果雖然表面上似乎未能支持理論的假設，但事實上，這很可能只是因統計所造成的虛假現象。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在本研究中無法經由實驗操弄使其完全獨立，而在實際的生

活上這二者也可能具有相當高的相關。事實上，就本研究的資料而言，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二變項確實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上學期， $r = .5$ ；下學期， $r = .4$ ， $p < .01$ ）。此結果顯示高自我表露往往伴隨著高知覺同伴回應的發生，或者高知覺同伴回應也往往能夠引發更多的自我表露，這點與前述的理論其實是不謀而合的，因為社會互動原本確實就應該是一個不斷循環影響的動態歷程。然而就統計而言，這個原本應屬於交互作用的效果，在迴歸分析中為求得淨效果的情形下，卻必然會被排除，因而造成不顯著的結果。筆者以為這其實是採自然實地研究的一個不可避免之問題，而對此一歷程更精確的驗證則有賴於實驗室之控制來補充對照了。

長期追蹤研究：上、下學期的交叉分析

雖然在實際的社會互動中，變項間的因果途徑極可能不是線性且單向的，但筆者也相信，透過長期性的追蹤研究對於時間序列的控制，卻也可以使我們對於可能的影響歷程獲得進一步的澄清。在本節中，筆者擬進行上、下學期之交叉相關分析。由於在邏輯上，時間點在後的因素不可能回頭影響時間點在前的因素。因此本節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上學期中的自我表露、知覺同伴回應、及關係親密感等變項對於下學期中這三個變項的預測效力如何。

如前所述，本研究之設計乃是受試者內設計，因此本節所欲探討的亦是受試者內的相關。更具體的研究問題則如：受試者在下學期中與不同互動對象的關係親密感，能否由上學期中與這些對象的互動性質來預測等。基於此一目的，筆者首先對資料進行了一番重整。由於本研究是以一個互動對象的社會互動側面圖為分析的單位，而在本節的分析中又必須比較上、下學期與某一特定互動對象的資料。因此只有在上、下學期均出現在受試者 RIR 記錄表內之互動對象才進入本節的分析，其他的互動則必須排除。然而如此一來，符合上述條件的受試者僅餘 35 人，平均每人亦有 7.5 個互動對象。資料的流失，確實使的本節的變項之信度及相關統計的考驗力均大為降低，然而這也是長期追蹤研究所難以避免的困境。在統計分析的策略上，仍沿用前述之階層式受試者內迴歸，以下學期之變項為依變項，在排除受試者之個別差異後，置入上學期之自我表露、知覺同伴回應及關係親密感等為獨變項，計算其單純效果之 R^2 ，再取此 R^2 之平方根為半偏相關係數（semi-partial correlation）。換言之，這些相關係數代表在排除個別差異之後，上、下學期變項間之受試者內相關係數。分析結果摘要如圖一。



圖一：上、下學期各變項間之受試者內交叉相關分析

由圖一可見，最強的相關是上學期與下學期之關係親密度間的相關（ $r = .6$ ， $p < .01$ ），表示關係的特性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上、下學期之間的親密度並無太大的改變。僅次於親密感間相關的是上學期之自我表露（ $r = .32$ ， $p < .01$ ）與知覺同伴回應（ $r = .40$ ， $p < .01$ ）對下學期親密感的預測力。此一結果再次地支持基於 Reis 及 Shaver（1988）親密理論的預測，亦即社會互動中的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會影響後續的關係親密感。

然而除了下學期的關係親密度確實可由上學期的社會互動之性質來預測之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的問：上、下學期間，關係親密感的「改變」（亦或消長）是否也可以被上學期之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來預測呢？根據理論來推演，這個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亦即深度的自我表露與高知覺同伴回應當使得關係親密感獲得進一步的提升。為了檢驗此一假設，筆者以下學期之關係親密感為依變項，在階層式迴歸中首先將虛擬變項及上學期之關係親密感置入迴歸式中，此時之剩餘變異量即為關係親密感上、下學期的改變量（Cohen & Cohen, 1975），然後再將上學期之自我表露或知覺同伴回應置入迴歸方程式中，此時所增加的 R^2 即為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可解釋親密感改變程度的比例。結果發現，只有知覺同伴回應達到統計的顯著性（ $R^2 = .02$ ， $F(1, 223) = 7.55$ ， $p < .01$ ）。此一結果雖然只部分地支持了原先的假設，但是和先前的結果卻大致相同。亦即，自我表露雖然也是親密歷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似乎比較扮演著必要而非充分的條件，因此其解釋變異量與其他變項的重疊就較大。而另一方面，知覺同伴回應則除了具有單純效果之外，其獨立效果也往往相當的顯著。這種結果顯示知覺同伴回應本身對關係的親密感就有一個直接的影響效果。

相對於上學期之社會互動性質對下學期之親密

感的預測力而言，上學期之關係親密感對下學期之社會互動性質的預測力雖然仍顯著，但是效果量則顯然較弱了（對自我表露， $r = .14$ ， $p < .05$ ；對知覺同伴回應， $r = .24$ ， $p < .01$ ）。相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上、下學期社會互動性質之間的相關。上、下學期間的知覺同伴回應之相關雖達 $.3$ ($p < .01$)，然而自我表露的相關卻只有 $.1$ ($p < .05$)。換言之，相對於關係親密感而言，下學期之社會互動的性質與上學期之各變項的關連較弱。而相對於知覺同伴回應而言，自我表露在時間上的穩定性又更低了。此一結果顯示，社會互動中的行為與感受很可能較易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而改變，而關係親密感則屬於較高層次的統整性知覺，因此較具穩定性。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人際關係中的親密感與日常生活的社會互動中的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等變項之關聯。自我表露可以是表露事實或表露想法及情緒；而知覺同伴回應則包括了解、關懷與肯定三個主要成分。根據 Reis 及 Shaver (1988) 的人際親密理論，筆者以為親密感的形成，係基於互動雙方不斷進行自我表露及不斷獲得知覺同伴回應所形成的一種關係知覺。本研究即是嘗試以一年的長期追蹤研究來驗證上述之基本假設，並利用追蹤研究對時間序列的控制來對變項間的影響歷程作進一步的探討和澄清。

主要的研究發現包括：第一、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在橫斷的時間面上，確實均與關係的親密感具有顯著的相關。並且在排除二變項間因相關所造成的重疊效果之後，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的獨立效果均依然達到顯著的水準。此一結果支持上述理論的假設，亦即「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二項社會互動的因素確為影響關係親密感的重要變項。此外，若比較上、下學期二個時間橫斷面的資料亦可以發現，上述的結果在上、下學期均表現出一致的趨勢，顯示此相關組型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

第二、「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對於關係的親密感之交互作用效果在上、下學期中均未達顯著水準，這一點並不支持原先理論的預測。然而進一步的分析則顯示，這個不顯著的結果很可能是由於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之高相關所造成。換言之，在實際的日常社會互動中，深度的自我表露大多會引發表露對象的高度回應，相對的聽者的回應也可能進一步的鼓勵更多更深的自我表露。如此一來，在資料上勢必缺乏高表露而低回應，或低表露而高回應之觀

測，因而難以顯現出交互作用效果。然而倘若上述的現象為真，那麼與上述親密理論的基本構想仍不謀而合。亦即，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二者可能是彼此互相循環影響的歷程，而親密感則是在這種良性循環的狀態下逐漸形成。而且也正因為這二變項難以獨立分離操弄的情形下，本研究採用自然實地的測量就勢必無法完全排除二個變項之主要效果與交互作用效果相重疊的問題。筆者建議未來可以實驗法做為輔助將二變項設法獨立操弄，則應可對此歷程作進一步的澄清，並與本研究結果相互的補充對照。

第三、由於本研究係採用一年追蹤研究，於上、下學期中各測量受試者之社會互動與人際關係，因此可透過交叉相關的分析來澄清可能的影響路徑。大體而言，上學期之自我表露、知覺同伴回應對下學期之關係親密感具有顯著的預測力，此一結果符合理論所論述的影響方向，然而上學期之關係親密感，對於下學期的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之相關亦達顯著水準，顯示這些變項間的影響路徑很可能並非單向且線性的。事實上，社會互動影響關係的形成與轉變，而在此同時，人際關係自然也在塑造社會互動的內涵。但是倘若我們仔細的審視這些相關係數，卻又可以發現幾個特殊的現象。首先，關係的親密感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這個結果正支持了筆者將關係親密感視為高層次之認知歷程的觀點。筆者以為關係親密感的形成並非決定於短暫的正向情緒而已，也並非是由偶發的社會互動所造成。而是個人在不斷互動的歷程中，經由逐漸的自我表露的嘗試，以及來自他人所表達出了解、關懷、與肯定的正向回饋中所慢慢形成的一種對關係的知覺。換言之，它是一種消化各種社會互動後所形成的產物。而正因為它是在長期的溝通歷程中形成與轉變，筆者以為它確實應該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

此外，在上述的交叉相關分析中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現象是：上學期之社會互動對下學期之親密感的預測力，明顯地優於上學期之親密感對於下學期之社會互動的預測力。這個結果顯示，雖然社會互動與人際關係是交互影響的歷程，但是較大的變異量仍歸於社會互動至人際關係此一影響路徑。這個結論不僅支持了 Reis 及 Shaver (1988) 的推論方向，同時也與 Kelley 等人 (1983) 的相依理論 (interdependency theory) 相符合。Kelley 等人認為人際關係具體而微的說，就是二個人建構其相互依賴及影響的歷程，而這種相依的歷程又必須建構於二人的社會互動之上。根據這個理論，人際關係不只是社會互動的結果，人際關係本身就是社會互動的一種展現的形式而已。筆者雖然接受「社會互動為人際關係之基礎」這

個推論的架構，然而卻不能同意將社會互動與人際關係視為等同。若就本研究的資料來看，人際關係具有相當程度跨時間的穩定性，然而社會互動卻缺乏這種穩定性。事實上，社會互動的狀況確實也很容易受到互動當時情境的特殊影響而表現出極大的變異。基於這二種截然不同的特性，筆者以為人際關係雖然是「消化」諸多社會互動之後的一種產物，然而個人卻又是如何在多變且不穩定的社會互動中發展出穩定的知覺呢？是否有那些社會互動的因素特別影響人際關係之知覺形成過程中的加數呢？本研究以自我表露及知覺同伴回應作為一個起點來探討這個歷程。更完整的面貌自然也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討。

本研究的第四個主要的發現是：雖然「自我表露」與「知覺同伴回應」均對關係親密感有顯著的效果，然而知覺同伴回應卻傾向於有較強的效果。倘若進一步地比對上、下學期中二個變項對關係親密感的單純效果與獨立效果，甚至可以發現自我表露可解釋的變異量，大多與知覺同伴回應的解釋變異量重疊，然而知覺同伴回應卻有近1/3的解釋變異量是屬於其獨立的效果。換言之，自我表露的效果幾乎是包含於知覺同伴回應的效果之內的。再就上、下學期的交叉分析而言，知覺同伴回應此一變項不僅較自我表露有較高的穩定性，而且對於後續的關係親密感也有較佳的預測效力。同時，知覺同伴回應也是唯一能夠顯著地預測上、下學期間關係親密感改變量的變項。綜合以上的結果，一個雖非筆者原先的預期，但卻似乎相當明顯的結論是：知覺同伴回應似乎是關係親密感的一個最核心的因素。

這個發現對於人際親密感的研究卻有其重要的涵義。正如同筆者在緒論中所作的文獻回顧所指出的，初期的研究者往往傾向於將自我表露視為人際親密感的最主要影響因素，甚或將其等同於親密感（如：Altman & Taylor, 1973）。後續的研究者已逐漸的納入更多的觀點嘗試拼湊一個更完整的面貌（如：Montgomery, 1981, 1984）。而Reis及Shaver（1988）的理論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他們嘗試以一個理論的模式將這些可能的重要因素以動態歷程的描述統整起來。他們的理論雖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概念架構，但遺憾的是卻極少有實徵的研究來對這個理論的模式提出驗證（除了Laurenceau, Barrett & Pitromonaco, 1998; Lin, 1992）。本研究除了是唯一以長期追蹤式設計提供一個實徵的檢驗之外，研究的結果更一致而且穩定的指出除了自我表露之外，知覺同伴回應也是親密關係歷程中一個核心的角色。而此結果，誠如筆者在緒論中對同伴回應的相關文獻中所指出，事實上與發展心理學的依附（attachment）理論具有類似的強

調，並且與臨床輔導心理學中大家耳熟能詳的案主中心療法（client-center therapy）等理論也相呼應。

近年來Murray等人（2003, 2005）的研究更是積極的展現此一觀點，他們主張伴侶的肯定與所提供的安全感，確實能夠有效的降低個體的防衛性，而在個體感受到正向的關懷之後，也就比較能夠以正向的態度來進行後續的互動。呼應此一相關的論述，本研究點出知覺同伴回應此變項的相對重要性。然而，究竟知覺同伴回應與關係中參與者之自我（或需求），及關係本身更詳細的動態歷程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澄清與探討。部分的研究者確實也已經針對這樣的關切展開研究，例如Drigotas、Rusbult、Wieselquist、Whitton（1999）提出米開朗基羅現象（Michelangelo phenomenon）之假設，主張伴侶所提供的肯定回應，將能夠使得個體逐漸的展現出原本被掩蓋住的理想自我，並且經由理想自我的逐步展現，進而增進主觀幸福感。然而在其實徵資料中，雖然發現伴侶之肯定回應對於幸福感具有顯著效果，但是理想自我的中介效果卻並不明顯。邱宗怡、林以正與雷庚玲（2004）則指出伴侶肯定應是透過增進了個體之自我確定性，來中介其與幸福感及關係滿意度的關連。這一系列的研究延續並擴展了對於對象回應的研究，但是卻也都僅只強調伴侶回應此一單面的效果，本研究更擬強調伴侶回應不可能單獨的存在，它勢必要放在關係與互動的社會情境之下才能夠獲得更充分的瞭解。因此，個體之自我、日常社會互動、以及關係之親密感三個層次之間如何交相影響，未來還需要研究者在理論及方法上做更多的突破。

本研究對研究方法的貢獻

除了上述幾個主要的發現以外，筆者以為本研究在研究及分析方法上的幾個特點也可以對未來相關課題的探討有具體的貢獻。首先在日常社會行為的測量上，本研究所採用的結構式日記式測量確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它不僅可以作為良好的描述工具，甚至可以發展成為評鑑的工具（林以正及黃金蘭，1993）。此外，此測量的工具在內容形式上也可以不限於測量社會互動，研究者可以針對其他的心理現象作適當的轉換。一個明顯的例子即是Miyake（1992）針對社會比較所作的修改，而林以正（1999）又進一步修改此一方法來測量華人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比較，其結果也相當有效的描繪出華人在不同關係中進行社會比較的各種動機性因素。具筆者所知，本研究則為國內使用此一方法測量日常生活中社會互動之首例，結果也顯示其確實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相對於一般

以籠統的自評量表，要求參與者針對一段相當模糊的時間段落所發生的經驗提供主觀的整體評估，應可更具體的描述實際的社會互動，有效的降低或評估可能的誤差來源。未來的研究可比照本研究關連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與關係整體親密感知覺此一模式，使用此方法探討社會互動與其他關係或健康指標等之間的關連性，當可更清晰的描述華人社會互動的特性。

其次，由於傳統以問卷法測量關係的親密感時，很容易受到受試者反應傾向的影響，而使得填答的結果產生趨中或趨高的傾向，以致於無法獲得充分的變異量來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以Q分類的方式來測驗關係親密感，似乎是一個相當好的替代方法。但是由於Q分類是以受試者內之相對標準為基礎，並不能作為受試者間之絕對測量。因此本研究在統計分析策略上，則以受試者內之階層式迴歸來加以配合。研究的結果顯示此策略不僅在測量的敏感度上，或者是統計的考驗力上都可以獲得相當好的提昇。這個方法不但在本研究中獲得了相當的成果，且其用途不限於此。基本上，大多數與人際關係之歷程相似的研究問題都可適用此方法。由於人際關係的歷程往往包括個人與多個不同對象之間的關連，因此在研究策略上也可以分成個別差異及關係等多個層次的分析。而本研究所運用的方式就特別適用於這種多層次的研究問題。

就筆者所知，本研究以受試者內階層式迴歸，應用於長期追蹤式的設計之資料分析也是一個相對較新的嘗試，研究的結果也顯示此一分析策略確實能夠有效的區辨變項間的不同效果。事實上，長期性追蹤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目的即是在探討個人改變的歷程，而一般的分析策略也是希望能將第一時間的個別差異控制住。然而就本研究的設計而言，我們不僅能以迴歸統計排除個別差異，更能進一步地以Q分類等設計加強受試者內的變異。筆者以為本研究對於合併幾個設計、測量、及統計分析作了一個相當良好的實驗性示範，可提供其他研究者做為未來研究的參考。當然這也只是一個方向。近年來，許多新的設計與分析方法，例如Kenny與LaVoie（1984）提出社會關係模式（Social Relational Model），或是Nezlek（2003）主張以隨機係數模式（Random Coefficient Modeling）來分析此一類型的資料等，都是嘗試對於這種多層次的相依資料提供適當的處理，未來的研究應可在累積了更多的資料之後，進一步比較不同議題之分析策略的計量特性，並作進一步的修正，以達到更精緻的目的。

附註

1. 在本階段雖有超過90人參加說明會，但卻只有48人實際完成第二階段的記錄工作。究其原因，實在是工作要求太多、負擔太重。而且受試者必須十分的去意識或判斷他的每一個互動，也構成相當大的心理壓力。然而在這種情形下，實驗者除少量的加分外，難以提供其他誘因，因而造成極大的受試者流失率。

2. 除親密外，受試者亦對喜歡、信任、對關係的確定感、內外團體區辨等進行同樣的分類作業。由於上述測量非本研究興趣，在本研究中未進一步分析此部分資料。這些作業雖然增加了工作負擔，但若純粹就信效度來說，由於親密感的Q分類是實驗參與者所進行的第一個分類作業，而問卷的填寫則是在完成所有分類作業之後進行，因此就本研究來說，這些額外的作業並不會減損參與者對於RIR或是親密感分類作業的疲勞程度，也不會影響本研究之結果與解釋。更進一步的來說，若以關係對象作為單位，計算親密、信任及自己人之分類分數之間兩兩的相關，結果顯示，親密與信任的相關為0.75，親密與自己人的相關為0.79，信任與自己人之間的相關為0.75。這些分數之間的高相關顯示，雖然三個概念之間有些微的差異，但是實驗參與者對於關係層次的區辨在不同的向度上還是有相當的一致性。在本研究中，雖然無法直接對親密感的Q分類進行信度考驗，但是上述的這些相關或許也可以作為關係Q分類的複本信度指標，支持參與者在進行關係分類時確實具有相當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 林以正（1999）。華人的社會比較：比較什麼，與誰比較，為何比較。「本土心理學研究」，11，93-125。
- 林以正、黃金蘭（1993）。「因何寂寞？由日常的社會互動檢證」。中華心理學會年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邱宗怡、林以正、及雷庚玲（2004）。「伴侶行為肯定對心理安適的影響」。台灣心理學會年會，國立政治大學。
- 黃光國（1988）。「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 Altman, I., & Taylor, D. A. (1973). *Social penet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Bem, D. J. (1972). Self-perception theory.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6*(pp. 1-6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erg, J. H., & Archer, R. L. (1980). Disclosure or concern: A second look at liking for the norm-break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8*, 245-257.
- Berg, J. H., & Archer, R. L. (1982). Responses to self-disclosure and interaction goal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8*, 501-512.
- Berg, J. H., & Clark, M. S. (1986). Differences in social exchange between intimate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Gradually evolving or quickly apparent? In V. J. Derlega, & B. A. Winstead (Eds.) *Friendship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p. 101-128).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 Berscheid, E. (1986). Mea culpas and lamentations: Sir Francis, Sir Isaac, and "The slow progress of soft psychology". In T. Gilmour & S. Duck (Eds.), *The emerging field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Hillsdale, NJ: Erlbaum.
- Berscheid, E. (1999). The greening of relationship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260-266.
- Bowlby, J. (1979).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affectional bonds*. London: Tavistock.
- Bowlby, J.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ldwell, M. A., & Peplau, L. A. (1982). Sex differences in same-sex friendship. *Sex Roles, 8*, 721-732.
- Cassidy, J., & Shaver, P. R. (Eds.) (1999).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 Chelune, G. J., Robinson, J. T., & Kommor, M. J. (1984). A cognitive interactional model of intimacy relationships. In V. J. Derlega (Ed.), *Communication intimac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11-40). New York: Academic.
- Clark, M. S., & Reis, H. T. (1988).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9*, 609-672.
- Cohen, J. & Cohen, P. (1975).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 science*. 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s.
- Cozby, P. C. (1973). Self-disclosure: A literature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9*, 73-91.
- Csikszentmihalyi, M., & Larson, R. (1984). *Being adolescent: Conflict and growth in teenage years*. New York: Basic.
- Davis, D., & Perkowski, W. T. (1979). Consequences of responsiveness in dyadic interaction: Effects of probability of response and proportion of content-related responses on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534-551.
- Davis, D., & Skinner, A. E. (1974). Reciprocity of self-disclosure in interviews: Modeling or social exchan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 779-784.
- Derlega, V. J., Harris, M. J., & Chaikin, A. L. (1973). Self-disclosure and reciprocity, liking, and the devia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 227-284.
- Drigotas, S. M., Rusbult, C. E., Wieselquist, J., & Whitton, S. W. (1999) Close partner as sculptor of the ideal self: Behavioral affirmation and the michelangelo phenomen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293-323.
- Duck, S. W. (1983). *Friends for life*. Brighton: Harvester.
- Duck, S. W. (1988). *Relating to others*.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Dorsey Press.
- Duck, S. W., & Miell, D. E. (1986). Cha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s. In R. Gilmour & S. W. Duck (Eds.) *The emerging field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133-143). Hillsdale, NJ:LEA.
- Ehrlich, H. J., & Graeven, D. B. (1971). Reciprocal self-disclosure in a dya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 389-400.
- Fiske, S. T., & Taylor, W. E. (1984). *Social cognition*. MA: Addison-Wesley.
- Fletcher, G. J. O., & Fincham, F. D. (1990). Attribution processes in close relationship. In G. Fletcher & F. D. Fincham (Eds), *Cogni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 Hillsdale, NJ: Erlbaum.
- Gable, S. L., Reis, H., Impett, E. A. & Asher, E. R. (2004). What do you do when things go right? The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benefits of sharing positiv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228-245.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

- tions. New York: Wiley.
- Helgeson, V. S., Shaver, P., & Dyer, M. (1987). Prototypes of intimacy and distance in same-sex and opposite-sex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4, 195-233.
- Hinde, R. A. (1979). *Towards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s*. London: Academic Press.
- Hwang, K.K. (2000). Chinese relation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30, 155-178.
- Jourard, S. M. (1964). *The transparent self*. New York: Van Nostrand.
- Jourard, S. M. (1971). *Self-disclosure: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transparent self*. New York: Wiley.
- Kelley, H. H. (1967). Attribution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D. Levine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Vol. 15 (pp. 192-238). Lincoln, N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Kelley, H. H., Berscheid, E., Christensen, A., Harvey, J. H., Huston, T. L., Lenvinger, G., McClintock, E., Peplau, L. A., & Peterson, D. R. (1983). *Close relationships*. San Francisco: Freeman.
- Kenny, D. A., & LaVoie, L. (1984). The social relations model.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aurenceau, J. P., Barrett, L. F., & Pitromonnaco, P. (1998). Intimacy a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The importance of self-disclosure, partner 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in interpersonal exchang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238-1251.
- Lin, Y. C. (1992).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e of intimacy from everyday social interaction*. Unpublished doctorate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Rochester, New York.
- Lynn, S. J. (1978). Three theories of self-disclosure exchan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4, 466-479.
- Markus, H. (1977). Self-schemata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63-78.
- Markus, H., & Smith, J. (1981). The influence of self-schema on the perception of others. In N. Cantor & J. F. Kihlstrom (Eds). *Personality, cogni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p. 233-262).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Mikulincer, M. (1998).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and the sense of trust: An exploration of interaction goals and affect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209-1224.
- Miyake, K. (1992). *Social comparison, and level and stability of self-esteem: Self-esteem management through social comparison*. Unpublished doctorate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Rochester, New York.
- Montgomery, B. M. (1981). Verbal immediacy as a behavioral indicator of open communication cont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0, 28-34.
- Montgomery, B. M. (1984).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predicting self and peer perceptions of ope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2, 233-240.
- Murray, S. L., Bellavia, G. M., Rose, P., & Griffin, D. W. (2003). Once hurt, twice hurtful: How perceived regard regulates daily marit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12-147.
- Murray, S. L., Holmes, J. G., & Griffin, D. W. (1996). The benefits of positive illusions: Ide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atisfaction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79-89.
- Murray, S. L., Rose, P., Holmes, J. G., Derrick, J., Podchaski, E. J., Bellavia, G., & Griffin, D. W. (2005). Putting the partner within reach: A dyadic perspective on felt securit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 327-347.
- Neter, J., Wasserman, W., & Kutner, M. H. (1985) *Applied linear statistical models*. Rochester, New York: Richard D. Irwin, Inc.
- Nezlek, J. B. (2003). Using multilevel random coefficient modeling to analyze social interaction diary dat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 437-469.
- Reis, H. T. (1984). Social interaction and well-being. In S. Duck (E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 Repair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21-4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eis, H. T. (1990). The role of intimacy in interpersonal

- relation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9, 15-30.
- Reis, H. T., & Downey, G. (1999). Social cognition in relationships: Building essential bridges between two literatures. *Social Cognition*, 17, 97-117.
- Reis, H. T. & Rusbult, C. E. (2004). Relationship science: a casual and somewhat selective review. In H. T. Reis & C. E Rusbult (Eds). *Close relationships: Key readings*. (pp. 1-20) Philadelphia, PA, US: Taylor & Francis.
- Reis, H. T., & Shaver, P. (1988). Intimacy as an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S. Duck (Ed.),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ory, relationships and interventions* (pp. 367-390). Chichester: Wiley.
- Repetti, R. L. (1989). Effect of daily workload on subsequent behavior during marital interaction: The roles of social withdrawal and spouse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651-659.
- Ross, M. (1989). Relation of implicit theori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histories.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341-357.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 119-135.
- Sternberg, R. J., & Grajek, S. (1984)The nature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312-329.
- Stokes, J. P. (1987). The relation of loneliness and self-disclosure. In V. J. Derlega and J. H. Berg (Eds.), *Self-disclosure: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pp. 175-202). New York: Plenum.
- Stone, A. A., & Neale, J. M. (1984). The effect of sever daily events on m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137-144.
- Swann, Jr. W. B. (1987). Identity negotiation: Where two roads mee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1038-1051.
- Swann, Jr. W. B., & Hill, C. A. (1982). When our identities are mistaken: Reaffirming self-conceptions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3, 59-66.
-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2).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D. Kahneman, P. Slovic, & A. Tversky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pp. 3-2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ring, E. M. & Chelune, G. J. (1983). Marital intimacy and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9, 183-190.
- Waring, E. M., Tillman, M. P., Frelick, L., Russell, L., & Weisz, G. (1980). Concepts of intimacy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68, 471-474.
- Wheeler, L., & Nezlek, J. (1977).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742-754.
- Wheeler, L., & Reis, H. T. (1991). Self-recording of everyday life events: Origins, types, and u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9, 339-354.



附錄一

修訂羅徹斯特社會互動量表 (RIR)

開始	a. m.	_____	小時
日期 _____	時間 _____	p. m.	長度 _____
名字縮寫			
_____ 男/女			
_____ 男/女 若超過三人：			
_____ 男/女 _____ 名男性 _____ 名女性			

支持與衝突							
	一點也不						非常符合
我給予協助和支持	1	2	3	4	5	6	7
我接受協助和支持	1	2	3	4	5	6	7
意見相左於及衝突程度	1	2	3	4	5	6	7

在這次互動中我……							
	一點也不						非常符合
傾吐事實	1	2	3	4	5	6	7
傾吐內在感受及情緒	1	2	3	4	5	6	7
親密或意義度	1	2	3	4	5	6	7
愉快	1	2	3	4	5	6	7
發起互動	1	2	3	4	5	6	7
主導互動	1	2	3	4	5	6	7

這次互動中讓我覺得……							
	一點也不						非常符合
感激	1	2	3	4	5	6	7
被拒絕/孤立	1	2	3	4	5	6	7
被傷害	1	2	3	4	5	6	7
溫暖/關懷	1	2	3	4	5	6	7
被鼓舞	1	2	3	4	5	6	7
訝異/驚奇	1	2	3	4	5	6	7
生氣/不耐煩	1	2	3	4	5	6	7
傷心/失望	1	2	3	4	5	6	7
緊張/害怕	1	2	3	4	5	6	7

在這次互動中同伴……							
	一點也不						非常符合
傾吐事實	1	2	3	4	5	6	7
傾吐內在感受及情緒	1	2	3	4	5	6	7
瞭解我	1	2	3	4	5	6	7
關切我的感受及情緒	1	2	3	4	5	6	7
引起共鳴	1	2	3	4	5	6	7

性質：約會 工作 事務 談話 打發時間

記錄時間：_____

意見：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to Relationship Intimacy: A Longitudinal Study

Yi-cheng Lin¹ and Chin-Lan Huang²

¹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² *Divis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debate of which factor, self-disclosure or partner responsiveness, plays the centr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timacy is still on and the dynamics among these factors remain unknown. According to Reis & Shaver (1988), however, the intimacy process begins when one person expresses personally revealing feelings or information to another person. To become intimate, the discloser must also feel understood, validated, cared for by the listener. Thus, this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 specific combination of self-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intimacy. Although the model does provide an insightful perspective,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has yet been done to test this model. The current study is design to test this theoretical model, looking at the role of self-disclosure an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to relationship intimacy. Furthermore, a longitudinal follow-up was conducted, in which both relationship intimac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both in the Fall and Spring semesters. Participants recorded their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using the Revised Rochester Social Interaction Recor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timacy with the interaction partners were measured by a Q-sort method. Because this study was a simulated within-subject design, hierarchical within-subject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which ruled ou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permitted us to focus

exclusively on relationship processes. Two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first conducted for the two cross-sectional phases separately. In both cases, the simple effects as well as the unique effects of self-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were all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both self-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are functional in the process of intimacy. The consistent results from both semesters also indicate that this correlation pattern was reliable. Cross-lag analysis showed that all the variables in time 1 were predictive of all the variables in time 2, indicating that the causal directions might not be linear nor unidirectional. Nonetheless, there were other trends especially worth noting. First, the highest correlation was between two relationship intimacy indices, whereas the interaction indices were relatively less reliable compared to the relationship intimacy. Second, both cross-sectional and cross-lag analyses showed that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had relatively stronger effect sizes than did self-disclosure.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were discussed. In addi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current methodology to the study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 processe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Revised Rochester Interaction Record, intimacy, self-disclosure, responsiveness*

